

故鄉的茶



人與事 郭曉懿

離鄉日久，總覺山水阻隔，生活中的重要，彷彿空置。思其內裏，最緊要的，原來是茶。

閩南人對於茶，簡直有天然的热情。年少聽聞閩南功夫茶，常暗自思忖，喝茶之人，莫非修習功夫，身手過人。經年之後，方才了然，言謂閩南人泡茶的功夫。閩南風俗文化，對於茶，千百年一脈傳承。這功夫不是人，而是人泡茶的功夫，心下不禁豁然。於腳下塵土和浩蕩歷史，敬意頓生。

小時候，周圍長輩就愛泡茶。孩童時也曾肆意逼及周圍人家，左鄰右舍見了，也不攔着，熱情招呼來喝茶。閩南人好客一說，可見一斑。功夫茶的架勢，大同小異。閩南茶壺茶杯，常用紅褐色陶器。泡茶前，茶杯圓形擺開，熱水澆壺。初茶卻是不飲，刻意洗杯。滾燙熱水再度入壺，不待浸茶，隨即端起茶壺，拇指捏着壺蓋，垂直向下，對着眾多茶杯旋轉，直至最後一滴。這一氣呵成的連貫，斟茶分寸的掌握，也是最功夫。

閩南以安溪鐵觀音聞名，長大方

知，閩北白茶也是一絕。但我少時，尚且不知世有閩北白茶，隨周圍喝慣鐵觀音。鐵觀音是烏龍茶的一種，滋味醇厚，性情偏苦，因此鍛煉了我承苦的味覺。多年後，喝到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等綠茶，便覺得清淡爽朗，別有一番江南氣。那江南山水清秀，三潭映月，斷橋殘雪，便彷彿溶在寡淡的茶水裏。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由此推知，一方水土也養一方茶。

小時候上學午休，常和奶奶一起喝茶，泡的也是鐵觀音。閩南人喝閩南茶，從少年及至老年，喝了一輩子，還是鐵觀音。便由老年及少年，猶如歷史傳承一般，將故土的烙印，通過杯杯茶盞，印在了品茶的滋味裏。所受的，是不言之教。

離鄉之後，再也沒有喝過鐵觀音，甚至連紅陶茶壺茶杯都沒有。手邊倒是有一罐西湖龍井和簡易過濾茶具。燒熱水，斟滿茶，茶湯淡黃清透，不似鐵觀音般紅潤。當下了然，知山重水復，早已不在故鄉。

那故鄉的功夫茶，泡茶的功夫，熱情招呼我喝茶的人，以及我的奶奶，都離我遠去了。抬起頭，望天上的圓月，頓覺冷露料峭。再看，便是獨在異鄉的悵然。

近年來一直在做翻譯的事，案頭一直放着《傅雷全集》第十九卷——《家書卷》。

對兒子傅聰除了談音樂、文藝和品德、學養，傅雷也提及自己的翻譯情況，尤其多次談到翻譯之難和之苦，對筆者這個尚在練習文學翻譯的老人來說，有很重要的促進、鼓勵意義。

在我們想像中，這樣一位大翻譯家，一代宗匠，精通法語和母語，翻譯起來一定才思敏捷，文思泉湧，所以能在三十餘年內完成五百餘萬字的譯作，把巴爾扎克、伏爾泰、羅曼·羅蘭的作品譯得如此精彩、典範——用字豐富，行文流暢，妙筆傳神，神似形似渾然一體，值得後輩學習、借鑒。

然而，文學翻譯畢竟不是輕鬆的事情，愛翻譯的魯迅就說：「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對傅雷而言，要譯的書也是有很多生詞的。翻譯巴爾扎克的《幻滅》三部曲的準備工作，他「足足做了一年半的時間」，起初甚至嚇了一跳，因為發現原文中「共有一千一百餘生字」。那不就「字典不離手」了嗎？他對傅聰說：「我發個狠每天溫三百至四百生字。」他似乎沒有出冷汗，還說這是「大有好處」的，但後悔不早就開始下記生字的苦功。他感慨說：「天資不足，只能用苦功補足。我雖到了這個年紀，身體挺壞，這種苦功還是願意下的。」結果他用三年半時間譯出《幻滅》的五十萬字。

有一次，傅雷又告訴兒子說：「我修改巴爾扎克初譯稿，改得很苦，比第一遍更費功夫。」他說：「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又說：「常常是改來改去，左也不稱心，右也不如意，改稿磨清後還得改一次，等到書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

下苦功記生字，改譯稿，確實是很苦的，而且要苦上好多年。傅雷到了晚年，身體差了，「每天七八百字的譯文苦不堪言，要換二三道稿



▲「千乘中山——古中山國精品文物展」展出的錯銀銅雙翼神獸。

錯銀銅雙翼神獸



市井萬象

「千乘中山——古中山國精品文物展」在廣州市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區開幕，展出一百七十五件（套）中山國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中山國位於今太行山東麓河北省中南部，是東周時期由中國北方遊牧民族白狄族鮮虞部所建立的諸侯國。 中新社

傅雷的苦功夫



如是我見 陳安

出版，真是「千呼萬喚」啊，不過幸好還是印出來了。

傅雷一生過得辛苦，文學翻譯辛苦，不得不參加一些不愉快的社會活動也很辛苦，最後不得不離人世自然已不是辛苦不辛苦的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然而，他一生也過得快樂。他在有書可譯時感到快樂，在給兒子寫信時感到快樂，兒子則在演奏鋼琴時感到快樂。他對傅聰說：「只有工作才快樂，大概我們一家都是這個脾氣。」「工作對我來說變成一種激情，一種狂熱，只有拚命工作才能對我有裨益。」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厚厚四大卷，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傅雷以四年時間翻譯了這部百萬字巨著。他在翻譯過程中常像音樂家克利斯朵夫一樣充滿歡樂，並在《譯者弁言》摘引了他的這一段話：

「歡樂，如醉如狂的歡樂，好比一顆太陽照耀着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一切成就，創造的歡樂，神明的歡樂！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唯有創造的生靈才是生靈。」

傅雷一生捱苦受難，因為文學創造而有了歡樂。

他閉門譯述，一生孤獨，但他說：「任何孤獨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獨，精神思想的孤獨。」正因為他有多元的文化，有豐富的精神思想，所以他是快樂的，能始終聞江聲浩蕩，眼見太陽普照大地。

你看《高老頭》結尾的附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譯 一九五一年七月重譯 一九六三年九月重改」。一部經典譯著就是這樣一遍遍譯出來，又一遍遍改出來的。

如今我們用電腦軟件寫作，修改詞句，調換段落，刪節或增補內容，一動鼠標就行，真是太方便了，可你想想當年老一輩作家如何埋頭爬格子、騰稿子，傅雷之「苦不堪言」便可想而知，幸虧他還有位賢妻常幫他抄抄寫寫，省了他不少功夫。

文學翻譯不僅難在生詞多、句型複雜，也難在西方作品裏的哲學觀點或宗教思想不是我們東方人所能輕易理解。傅雷就親自感受到這一點。巴爾扎克的小說哲學味特別濃，傅雷說他花了很大的勁才勉強讀完，覺得其神秘的玄學氣息不容易接受，至多是了解而已，談不上欣賞和共鳴。可又要準確通順地譯出來，他就得「花很大的耐性」去讀幾部研究巴爾扎克小說的論著。這顯然也是一種苦，又怎能躲過呢？

翻譯苦，等譯書問世也苦。傅雷常常焦急地等兒子從國外寄來新灌的唱片，如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等，可總是不能及時收到，他感慨說：「我譯的書是千呼萬喚印不出，你的唱片是千呼萬喚寄不來。」他這短短一句話，顯然是「苦不堪言」。筆者有此體會，一部譯稿先後在三個出版社共存了十二年之久，最後承蒙上海譯文出版社作為重要作品

子」。

出版，真是「千呼萬喚」啊，不過幸好還是印出來了。

傅雷一生過得辛苦，文學翻譯辛苦，不得不參加一些不愉快的社會活動也很辛苦，最後不得不離人世自然已不是辛苦不辛苦的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然而，他一生也過得快樂。他在有書可譯時感到快樂，在給兒子寫信時感到快樂，兒子則在演奏鋼琴時感到快樂。他對傅聰說：「只有工作才快樂，大概我們一家都是這個脾氣。」「工作對我來說變成一種激情，一種狂熱，只有拚命工作才能對我有裨益。」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厚厚四大卷，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傅雷以四年時間翻譯了這部百萬字巨著。他在翻譯過程中常像音樂家克利斯朵夫一樣充滿歡樂，並在《譯者弁言》摘引了他的這一段話：

「歡樂，如醉如狂的歡樂，好比一顆太陽照耀着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一切成就，創造的歡樂，神明的歡樂！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唯有創造的生靈才是生靈。」

傅雷一生捱苦受難，因為文學創造而有了歡樂。

他閉門譯述，一生孤獨，但他說：「任何孤獨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獨，精神思想的孤獨。」正因為他有多元的文化，有豐富的精神思想，所以他是快樂的，能始終聞江聲浩蕩，眼見太陽普照大地。

然而，文學翻譯畢竟不是輕鬆的事情，愛翻譯的魯迅就說：「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對傅雷而言，要譯的書也是有很多生詞的。翻譯巴爾扎克的《幻滅》三部曲的準備工作，他「足足做了一年半的時間」，起初甚至嚇了一跳，因為發現原文中「共有一千一百餘生字」。那不就「字典不離手」了嗎？他對傅聰說：「我發個狠每天溫三百至四百生字。」他似乎沒有出冷汗，還說這是「大有好處」的，但後悔不早就開始下記生字的苦功。他感慨說：「天資不足，只能用苦功補足。我雖到了這個年紀，身體挺壞，這種苦功還是願意下的。」結果他用三年半時間譯出《幻滅》的五十萬字。

有一次，傅雷又告訴兒子說：「我修改巴爾扎克初譯稿，改得很苦，比第一遍更費功夫。」他說：「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又說：「常常是改來改去，左也不稱心，右也不如意，改稿磨清後還得改一次，等到書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

下苦功記生字，改譯稿，確實是很苦的，而且要苦上好多年。傅雷到了晚年，身體差了，「每天七八百字的譯文苦不堪言，要換二三道稿

子」。

出版，真是「千呼萬喚」啊，不過幸好還是印出來了。

傅雷一生過得辛苦，文學翻譯辛苦，不得不參加一些不愉快的社會活動也很辛苦，最後不得不離人世自然已不是辛苦不辛苦的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然而，他一生也過得快樂。他在有書可譯時感到快樂，在給兒子寫信時感到快樂，兒子則在演奏鋼琴時感到快樂。他對傅聰說：「只有工作才快樂，大概我們一家都是這個脾氣。」「工作對我來說變成一種激情，一種狂熱，只有拚命工作才能對我有裨益。」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厚厚四大卷，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傅雷以四年時間翻譯了這部百萬字巨著。他在翻譯過程中常像音樂家克利斯朵夫一樣充滿歡樂，並在《譯者弁言》摘引了他的這一段話：

「歡樂，如醉如狂的歡樂，好比一顆太陽照耀着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一切成就，創造的歡樂，神明的歡樂！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唯有創造的生靈才是生靈。」

傅雷一生捱苦受難，因為文學創造而有了歡樂。

他閉門譯述，一生孤獨，但他說：「任何孤獨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獨，精神思想的孤獨。」正因為他有多元的文化，有豐富的精神思想，所以他是快樂的，能始終聞江聲浩蕩，眼見太陽普照大地。



▲傅雷譯《約翰·克利斯朵夫》。資料圖片

電影熱



自由談 周軒諾

近來城中颯起一陣電影旋風，先是有笑中帶淚、勵志的《熱辣滾燙》，女主角地獄式減磅引起熱議。然後是數日前在洛杉磯舉行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和講述原子彈誕生的《奧本海默》。緊接着台灣影片《周處除三害》在內地賣個滿堂紅，高踞票房榜首，收近五億元人民幣，成為眾人茶餘飯後的談資。繼而便應是香港影迷關注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提起在一個月後舉行的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有份入圍角逐最佳男主角的五名演員當中，有一位是來自東北吉林的八〇後，他就是大鵬。

大鵬，本名董成鵬，東北二人轉表演藝術家趙本山的高足，初出茅廬時跟趙氏其他弟子王小利、小瀋陽、宋小寶一樣走搞笑路線。大鵬其後執導《屌絲男士》，一炮而紅。他二〇一四年的《大宅們》和二〇一五年自編自導自演的《煎餅俠》，都逗得人樂開懷，之後擔綱演出的《縫紉機樂隊》也不離風趣幽默，不論是被調侃還是對別人的對白，都叫人拍案叫絕。在二〇一六年的《我不是潘金蓮》中，大鵬飾演假仁假義的法官，從此我對他另眼相看。再到二〇一九年，我看完他與柳岩主演的《受益人》後，驚嘆他竟有如此令人眼前一亮的內心戲演繹，感人肺腑、催人淚下，至少令我動容，佩服他能駕馭喜

劇、懸疑劇、文藝劇，與另一影帝張譯一樣，戲路廣泛，亦莊亦諧。

這次大鵬獲提名的電影叫《第八個嫌疑人》，故事發生在清源市（實為廣東清遠），劇情既大多圍繞粵語區，所以劇中情節理所當然地加插了大量粵語元素，對在粵語區長大的人來說，分外親切。此劇扣人心弦、引人入勝，但不在在此劇透。

《第八個嫌疑人》又扯出兩位好戲之人：張頌文和林家棟。張頌文是實力派，演技精湛，毋庸置疑。《春風沉醉的夜晚》《不再讓你孤單》《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革命者》《不速來客》《狂飆》，這些張頌文參演過的作品我全看過。張是廣東韶關人，不時在影片中秀幾句粵語，讓我會心一笑。林家棟也是演技爐火純青的演員，作品數不勝數，影壇頭銜絕非浪得虛名。

其實，演員是不想自己局限做某一類型的專業戶的，什麼皇帝專業戶、岳母專業戶、總裁專業戶、大俠專業戶、殺手專業戶……從來都是戲迷和媒體歸納的，不會是演員本身，演員自己多數不會願意局限做某某類的表演者。對一個專業與敬業的演員而言，哪有什麼正派、反派、古裝、時裝之分？演員就是演員，角色就是角色，演什麼，就是什麼，就這麼簡單。試問有哪一位演員會喜歡終身飾演某一類角色？哪怕這一角色能令其名利雙收。

所以，大鵬的轉型，是喜出望外，亦是意料之中。

成都和四川老家的記憶



人生在線 余乘桴

我出生於四川一個縣城的鄉下，所以自小對成都便有着濃濃的嚮往之情，不僅僅是因為那裏美食很多，成都更像是一個有着四川豐富文化底蘊的縮影。所以一有假期，便想抓住機會去成都旅行，感受那裏的風土人情。生活在現代城市很容易就被快節奏的日常影響到方方面面，而成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它雖然是一個大型的城市，但生活節奏和城市的氣息卻充滿悠閑，令我十分嚮往。

去到成都一定要去喝茶，找一天下午，選一個茶館，什麼都不用去想，就靜靜地喝茶，看周圍的人打牌、逗鳥或者下棋，看他們自在的生活在這個空間裏面，茶涼了會有夥計來幫忙續上，我只需要懶懶地坐在那裏，時間就這樣慢慢地流走。

偶爾也會選擇在城市中漫步，在寬窄巷子裏品嚐各種美味，成都的小吃雖然大多都離不開辣椒，卻是那種不會讓人熱氣上火的新鮮，反倒是讓人一吃就停不下來。成都的辣椒還有個特色，喜歡在佐料中加入青色的花椒，這種花椒也是成都本地的特產，提供麻辣的味覺享受同時，還有嗅覺上的鮮味。

除了吃的，我也會去成都的杜甫草堂走一走，感受杜甫筆下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過去屬於城郊的房子，現在已算是位於市中心。因此，在城市中間有這麼一個地方可以放下煩惱，

去感受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心境，多麼難得啊。在草堂裏，陳設着杜甫留下來的詩歌，院子裏還有竹林，風吹起來的時候顯得格外動人，彷彿又回到了過去簡單而自在的日子。

我很喜歡成都這座城市，但每次在城市中行走，或者看着街頭巷尾生活老百姓，反倒會湧出絲絲憂傷，讓我想起老家鄉下的人事。當然，現在的鄉下已經與記憶中的模樣大相徑庭，也因為全家遷出後已經很難再找到理由回去，因此那些嶄新的模樣似乎與自己也沒有任何連結了。

對比起來，成都的市井生活雖然是更有城市的精緻氣息，卻也少了鄉下獨有的泥土氣息和淳樸的風土人情。還記得與先生拍拖時，第一次帶他回四川老家，給他帶來了

不小的文化衝擊。首先是鄉下人的直率和大嗓門；其次是原來四川的「辣」並不是想像中的「辣」，也不是外省許多川菜強調的「辣」，反倒是從口入心的暖，再伴上各種香料疊加的美味體驗。也大概正是因為有如此的體驗，所以在後來相處的日子，他能明白和體諒我性格中的許多「瑕疵」。

我的鄉下雖然隸屬於四川，實際上與重慶更近，因此方言的口音實際上與重慶相似，同成都的口音區別倒是挺大。說話談吐沒有成都人來得軟糯，因此性格相比成都人，可以說也來得更為直接，當然這也是川渝地區人士時常掛在嘴邊的爭論。

雖然是在農村出生，但未到一歲便去到小鎮上生活，實際上在鄉下的生活大多集

中在暑假。因此對於家鄉的記憶往往是帶有炙熱的夏天味道，比如在外公的後山果園裏，躺在懸崖上的草屋裏一邊曬着太陽，一邊吃着剛摘下來的水果。或者夜晚的時候，趴在涼席上，外婆用蒲扇輕輕拍在我的身上，嘴裏喃喃講着有的沒有的故事，慢慢地就睡着了。外公外婆家的後山有果園，還有用來儲存紅薯或其他糧食的地窖，而爺爺奶奶家的後山就顯得單調了很多。只有成片的樹林，沒有什麼好玩的，有時候只能跟小夥伴們玩捉迷藏，不過玩到後面又變成了在山間滑梯遊戲。

我後來在小鎮成長不到十歲又去到重慶這座城市生活，可能在現在看來鄉村與城市的區別很大。但在我還小的時候，對於這種環境的差異在體感上實際是不明顯的。即使是現在，無論是在成都還是重慶的城市中，其實還是可以觀察到農村生活的影子，比如飲食、語言等等，又或者說對於川渝地區的生活來說，城市到處都是高樓大廈，但城市的內在核心即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態度或者方式，麻辣、飲茶以及火鍋等等其實差異性並不大。

隨着年紀的遞增，有時候不經意間總會慶幸自己是一個四川人，在這樣豁達而又接地氣的文化中生長。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川渝不僅給了我關於為人處事的最初的文化啟蒙，也用它的愜意生活態度滋潤和治癒着我的人生。



▲杜甫草堂一景。資料圖片